上篇　蔡元培鲁迅美育思想的发展

在中国，美育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周代，已把美育作为当时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的“乐”，包括音乐、舞蹈、诗歌，就是有关美育的内容。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首倡私学，在教育内容上承继西周“六艺”，特别注意通过审美教育去培养完善的人格。“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他还特别看重艺术的社会功能，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二千五百年前，孔子对美育能有如此深邃的认识，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真正开始建立中国自己的美育体系，广泛地予以提倡并付诸实践，还是在近现代，并且是在西方的资产阶级美学传入中国之后。

要研究中国近代的美育思想，不能不首先提到王国维。王国维是我国近代自觉输入西方资产阶级美学思想，并使中国传统的美育思想带上近代色彩的第一位资产阶级美学家。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著有《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观堂集林》。

王国维一生在学术上取得了多方面成就，著作浩瀚，无论是对史学、哲学、文学，还是甲骨文、殷周金文、汉晋竹简和封泥的研究，都有独特建树。

王国维的美学研究，是伴随着他的哲学研究而开始的。为了解决人生的疑问，解决自己的苦闷，他想从西方资产阶级美学家康德、叔本华的著作中去寻找答案和慰藉；而康德关于文学艺术超功利的美学主张及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也与王国维建立在以“欲”为基本观念的历史唯心主义一拍即合。尽管他也产生过“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的“疑问”（《遗书》第15册），但却没有从康德，叔本华的影子后面走出来，而是“中止在了一个阶段上，竟成了时代的牺牲”(1)。关于他的美学思想，有人做过这样的概括：

> “王国维的美学思想表现为两个基本侧面：一是要求艺术脱离政治,变成人生‘解脱’的工具；二是要求艺术脱离社会斗争内容，变成表达‘真性情’的纯形式。前者表现为《〈红楼梦〉评论》的悲观主义；后者表现为《人间词话》的境界说。产生这种理论的根源是他对于美的观点的形式主义。他吸收康德、叔本华等资产阶级的美学观点，并且是把它系统化于中国的第一人。”（2）

王国维的美育理论就是这样的一个美学思想的具体应用。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在我国近代，他是比较系统提出美育

（1）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郭沫若选集》第12卷

（2）林同华：《中国美学史论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522页

思想和主张的先驱，写过许多教育、美育的文章，并第一个提出将美育列入教育方针。这些贡献是开拓性的，必须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

一、首倡以“美术”代宗教。早在1906年，王国维就在《去毒篇》一文中率先提出：“美术（泛指文学艺术——作者）者，上流社会之宗教也”，而蔡元培发表《以美育代宗教说》的著名讲演，是在这十多年以后的事。王国维从根治鸦片流毒谈起，认为这种“亡国的疾病”的泛滥，是由于“国民之无希望无慰藉”，“此等感情上之疾病”不是干燥的科学、严肃的道德所能治愈的，“非以感情治之不可”，这是因为“人之心力不寄于此则寄于彼，不寄于高尚之嗜好，则卑劣之嗜好所不能免矣。”为此，只能诉诸美术与宗教，下等社会“慰”之以宗教，上流社会则以“美术”代宗教。这里闭口不谈封健官僚的腐败无能，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不从社会改革中寻找根治办法，说明了王国维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但他看到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人们病态的感情，肯定了美育的社会作用，是难能可贵的。当然，这个作用的发挥，是因为在他看来，文艺可以引导人们从苦闷中解脱，可以逃避现实，根柢还在他的唯心主义的美学观，这是我们必须指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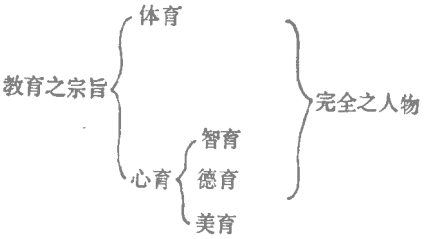
二、把美育与德育、智育、体育并列，提出培养“完全之人物”。

王国维在1906年写过一篇《论教育之宗旨》，开宗明义：

> “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合是也。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者：一曰身体之能力，二曰精神之能力。……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

也。对此三者而有真美善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善美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三部：智育、德育（即意志）、美育（即情育）是也。……(1)

在这篇文章的后面，他还把他的这一思想归纳为一个图表：



这些思想不但在当前可谓极有见地，就是在今天也值得我们引起重视，特别是他把美育和德智体三育相提并论，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无疑是一个创举。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指出，王国维把教育分为智、德、美三个部分也是有所本的，那就是西方近代心理学关于知、情、意的三分法。

三、关于美育性质、作用的论述。

王国维在《论小学校唱歌科之材料》一文中，对美育的性质、作用有很精辟的论述。他认为美育的“第一目的”在于对人进行情感教育（“调和其感情”），提高其审美能力（“练习其聪明官及发声器”）；同时，它也是智育、德育（“陶冶其意志”）的重要手段，王国维认为这是“第二目的”。不能让美育沦为德育的“奴隶”，如果“以干燥拙劣之辞述道德之

（1）《中国近代史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10月版，第1008—1010 页

教训”，不注意美育自身的特性，那就只能是“善”与“美”两败俱伤，“恐第二目的未达而失其第一之目的矣。”(1)这些看法对以“明人伦”为重心的封建主义教育显然是一个挑战，并为新的美育理论的建设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就对近代文艺界的影响而论，梁启超要早于也大于王国维。早在1902年，梁启超亡命日本时，就倡导“小说界革命”，并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著名论文；而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发表于1904年，《人间词话》则完成于1908年。但是，梁启超是一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和宣传家，主要活动不在美学领域，即使讨论“小说界革命”，也往往更多地着眼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远离了艺术创作实践。因此，我们称王国维是我国第一个资产阶级美学家。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著有《饮冰室合集》，包括文集和专集两个部分。

诚然，梁启超的历史地位主要在思想宣传方面，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撰写了一系列文章，鼓吹、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道德思想，在当时造成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如郭沫若所说：

> “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学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青少年时代》）。

（1）《美学资料选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473—474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但是,他关于美育的许多言论还是独具特色、令人耳目一新的。他认为“情感”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所以“情感教育”非常重要，它是一种内在的感化，不象理性教育，只靠外在的灌输；而且他把培养受教育者的高尚情操当作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这种工夫做得一分，便是人类一分的进步。”(1)

特别要提到的，梁启超关于小说美学的论述，虽说一些观点较为偏执，但也不乏精辟之见。

一、肯定小说的认识作用。

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首先自己设问：“人类之普通性，何以嗜他书不如其嗜小说？”，他认为原因有两点：

其一：

“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触受之空气者也。”

其二：

“人之恒情，于其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阅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无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骇，为忧为惭，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写其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谓‘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为甚。”

概言之，梁启超认为小说之所以能吸引人，感动人，就在于它的认识作用。正是因为小说“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足

(1) 《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饮冰室文集》卷37

以移人”，所以在梁启超看来，“小说为文字之最上乘”。

尽管在文章中，梁启超在设问之后，对于人们认为小说之所以吸引人是“浅而易解”，是“乐而多趣”，全都没有谈到点子上；但梁启超自己也没有能从美学理论上特别是没有从美感作用这一点进行深层分析，还是让人感到“未足以尽其情也。”(1)

二、重视艺术的感染作用。

小说对人的影响，是通过什么途径进行的？梁启超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认为“小说之支配人道也，复有四种力”。哪四种力呢？一是“熏”，即熏陶。“熏也者，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二是“浸”，即浸染。如果前者是就空间来谈的，那后者是就时间而言。“浸也者，入而与之俱化者也。”三是“刺”，“刺也者，刺激之义也。熏浸之力利用渐，刺之力利用顿，熏浸之力，在使感觉者不觉；刺之力，在使感觉者骤觉。刺也者，能入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者也。”四是“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内而脱之使出，实佛法之最上乘也。”如果把“刺”理解为顿觉，那么“提”就是入境。这四种力，一言以蔽之，就是讲的艺术的感染力，也就是小说之所以能影响人的情感、心境的原因所在。

作为宣传家，加之“笔端常带感情”，梁启超议论问题经常任意夸大，致使认识上出现片面性，对于这四种力，梁认为：

> “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门，政治家所以能组织政党，莫不赖是。文学家能得其一，则为文豪，能兼其

（1）《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0月版，第151—155页

四，则为文圣。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说。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1〕

这些议论，不仅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片面、肤浅，就是与他的同时代人王国维相比，也缺乏理论深度，只能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三、强调文艺的社会作用。

对于小说的社会地位与作用，梁启超已经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如空气”，“如菽粟”，须臾不可缺少。假如我们按照他的宣传语言加以概括的话，那只能得出这样二条结论：

一是万恶之源：

“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

读书做官、儿女多情、巫女神汉、体弱多病、一盘散沙、自私自利、谋财害命等等，等等，莫不都来自小说，梁启超已经有言在先，小说是“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在美学上，王国维追求艺术的“超功利”，梁启超却强调“艺术政治功利化”，两者显然是片面两极，但却殊途同归，都抹杀文学艺术的社会性、阶级性，都矢口否认中国的“腐败”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造成的，只有进行社会革命才能彻底解决。这是

（1）《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0月版，第151—155页

由他们的政治立场、世界观决定的。

二是唯此为大：

>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1）

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文化艺术对经济基础、社会改革、精神文明建设的巨大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但无限夸大，得出小说决定一切，就是十分荒谬的了，说明梁启超已经深陷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王国维、梁启超，是西方资产阶级美育思想的传播者，是我国近代美育理论建设的先驱，贡献卓著，功彪史册；但他们割裂真善美，偏执“超功利”、“艺术功利化”的两极，对于我国近代美学史，也流弊甚远，不可低估。

（1）《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0月版。第151—155页

第一章　蔡元培传略及其美学美育思想

蔡元培生活在一个内忧外患、多灾多难的时代：一方面是腐败无能、连年战祸、国土沦丧、卖身投靠；一方面是民主、进步、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人民在血与火里撕杀拚搏。一方面是荒淫无耻，在垂死中挣扎；一方面是嗷嗷待哺，在扼杀中新生。仿佛把数百年的历史压缩在几十年里，皇帝、军阀、流寇、买办、汉奸、举人、洋奴、博士、革命家、学生领袖、战士、庄稼汉、掘煤工……同在近代中国一个舞台上表演，是喜剧、闹剧，抑或是悲剧、正剧？但是，正是这个时代，造就了一代革命英才、文化巨人——蔡元培就是他们之中的一位。

“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
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1）

（1）周恩来同志挽蔡元培先生联，原载1940年4月19日延安《新中华报》

一、蔡元培生平与对我国文教事业的巨大贡献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改字仲申；号鹤庼，后改号子民。1868年1月11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城内笔飞弄。蔡元培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教育家，他把自己宝贵的一生全部贡献给了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早在1940年3月8日，毛泽东同志致蔡元培先生家属的唁电中就高度地评价他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1）

关于他的家庭及其给予他的影响，蔡元培自己有一段口述传略：

> "蔡氏以明季自诸暨迁山阴，其初以艺山售薪为业，至子民之高祖以下，始为商。子民之祖名嘉谟，字佳木，为某典经理，以公正著。其父名光普，字耀山，为钱庄经理，以长厚称，家中人至以'爱无差等'笑之。子民之母周氏，贤而能。……子民丧父时，仅11岁。有1兄，13岁。又有1弟，9岁。其父素宽于处友，有贷必应，欠者不忍索，故殁后几无积蓄。世交中有欲集款以赡其遗孤者，周氏不肯承认，质衣饰，克勤克俭。抚诸儿成立，每以'自立，'不倚赖'勉之。……故子民之宽厚，为其父之遗传性。其不苟取，不妄言，则得诸母教焉。"（2）

1. 学子生涯

6岁时入家塾，原乳名阿培，入塾后，取名元培。父亲去

（1）原载1940年3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

（2）《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1984年7月版，第249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世后，家中无力延聘塾师，从1877年起，附学于他处。蔡元培自幼好学，每每苦读至夜深，家贫不能置灯，就借灶炉火光照明。

蔡元培的叔父蔡铭恩，以廪膳生乡试中式，是蔡家上几代中唯一读书登科的人。在叔父的悉心指导下，他阅读了《史记》、《汉书》、《困学纪闻》、《文史通义》、《说文通训定声》等书，从而走上了治学之路。

从14岁起，蔡元培受业于同县秀才王懋修（子庄），受王的影响，蔡元培青年时代崇拜宋儒，讲究孝道。“母病，躬侍汤药，曾刲臂和药以进。”(1)

17岁（1883）考中秀才；18岁至19岁在乡里设馆教书，20岁以后，“读书于同乡徐氏，兼为校所刻书。徐氏富藏书，因得博览，学大进”。(2)

23岁（1889）赴杭州，应乡试，中举人；24岁（1890），去北京，应会试，告捷；26岁（1892），再去北京，应殿试，进士及第，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28岁（1894），应散馆考试，又由庶吉士升为翰林院编修。这就是蔡元培早年的一段封建学子生涯。

2. 投身教育

1894年6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第二年，中国方面败北，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对此，蔡元培极为悲愤：

> “和约十事，其大者，割奉天辽阳以东，遵海而南至旅，给兵费二万万，定七年毕给。倭人驻兵威海，岁给兵费五十万。俟二巨万毕给，乃退兵，皆允

(1)(2)《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1984年7月版第249页、第250页

之矣。日蹙百里，且伏祸机。韩、魏于秦，宋于金，不如是之甚也！……疆臣跋扈，政府阘茸，外内狼狈，虚疑恫愒，以成炀灶之计，聚铁铸错，一至于此，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1）

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新政”的破产，也宣判了满清帝国的大厦将倾。救亡图存，成了时代的主题，已经严峻地摆在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面前。翰林院也在风雨飘摇之中，“自甲午以后，朝士竟言西学”（2），已经不是昔日那样平步青云，伺机跻身于达官显贵之列的“学府”了。蔡元培一向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不计较个人的仕途荣辱，面对国家民族的兴衰大计，儒家经典，已经远远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望。他把眼睛转向新学，开“始涉猎译本书”（3），想从西方的科学文化中寻找一条救国之路。“都无作官意（张籍），唯有读书声”（4）这书写在蔡元培京寓书斋中的十个大字，既表明了他当时的心声，也是他几年来翰林院生活的真实概括。

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的兴起，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以达救亡图强目的的尝试。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这个“百日维新”还没有呱呱坠地，就以流产流血而告终。这个血的教训第一次告诉人们，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只能是个幻想。

蔡元培对于康梁的变法维新是同情的、支持的，但他也清醒地看到他们只寄希望于少数人、孤立无援的致命的弱点；而

（1）转引自《蔡元培年谱》（高平叔）第 7 页

（2）（3）《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 25页

（4）高平叔：《蔡元培年谱》，第10页

戊戌变法的被镇压，又进一步暴露了清王朝的不可救药。蔡元培决心走“教育救国”的路，他后来在回忆自己这段心情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 “子民是时持论，谓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此后北京政府，无可希望，故抛弃京职，而愿委身于教育云。”（1）

1898年9月，蔡元培抛弃官职，携眷南下，回归故里。同年冬，就任绍郡中西学堂总理（即校长），这是他踏上“教育救国”之路的第一个台阶。

中西学堂是绍兴公款设立的。依学生程度，分为三斋，略同于现在的高小、初中、高中一年级。对于这所新式学校，当时在第一斋读过书的蒋梦麟回忆道：“顾名思义，中西学堂教的不但是我国旧学，而且有西洋学科。这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一种新尝试。虽然先生解释得很粗浅，我总算开始接触西方知识了。……对记忆中的旧观念则弃如敝屣。”（2）

新旧两派教员常常发生争执。新派教员笃信进化论，对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旧习，随时加以纠正，这引起旧派的忌恨，以致运动到校董。校董出面干涉，蔡元培愤而辞职，任期仅一年。

辞职后，蔡元培曾任嵊县剡山书院院长一年，后因该院经费困难无力解决，又辞掉了。与此同时，诸暨丽泽书院亦聘他为院长，蔡元培未应聘就职，并劝其将书院改为学校。

（1）《葵元培先生纪念集》第251页

（2）蒋梦麟；《西湖》，香港学风出版社1959年版

1900年至1901年间，他还曾去临安县，为绍兴侨农设一小学校。又在杭州改某书院为师范学校，未成。其间，他还起草了一份《浙江筹办学堂节略》，撰写有《学堂教科论》一书。蔡元培所作这一切，都是希冀于在浙江全省扩大新式学校教育。

3. 辛亥元勋

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签订，说明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的进一步合流，国家危在旦夕，人民水深火热，正如孙中山所说：

> “庚子失败以后，……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之风潮自此萌芽矣。”(1)

在这个历史转折中，许多知识分子开始抛弃改良的幻想，踏上了革命的征途。蔡元培顺应了这个历史的潮流，并走在了前列。如果说在浙江投身教育，他还只是单纯地着眼于教育的改革，宣传新的教育思想；那么在上海，他已经开始把学校变成了反对封建王朝，从事革命宣传，造就革命英才的阵地了。

1901年夏，蔡元培应刘葆良之请，到上海代理澄衷学堂总理，一个月后，刘介绍他去南洋公学任教。

南洋公学本为洋务派官僚盛宣怀于1897年奏准在上海开办的，是交通大学的前身。内设四院：师范院，即师范学堂，为公学培养师资；外院，即附属小学；中院，即中学堂；上院，即大学堂。外、中、上三院均为四年，互相衔接，依次递升。

当时，南洋公学新开设一特班，学生都是旧学根底较好

（1）孙中山：《革命之缘起》，转引自《蔡元培传》（周天度），第10页

的，拟授以外语及经世之学，然后择优保送经济特科。蔡元培是该班的总教习，其教学方法，深受当时学生欢迎，就是对我们现在的学校教育，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据黄炎培回忆：

> “其读书也，吾师手写修学门类及每一门类应读之书，与其读书先后次序。……文学、论理、伦理等等，每生自认一门，或二门，乃依书目次序，向学校图书馆借书，或自购阅读。每日令写札记呈缴，手自批改。隔一二日发下，批语则书写于本节之眉。佳者则于本节左下角加一圈，尤佳者双圈。每月命题作文一篇，亦手自批改。每夜召二三生入师朝夕起居之室谈话，或发问，或令自述读书心得，或对时事感想。全班42人，计每生隔十来日得聆训话一次。入室则图书满架，吾师长日伏案于其间，无疾言，无愠色，无倦容，皆大悦服。”

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蔡元培号召学生关心世界，学习外国：“今后学人须具有世界知识，世界日在进化，事物日在发明，学说日新月异。”他还亲自教学生日文，指导学生练习由日文译成中文。还鼓励学生练演讲，说国语：“今后学人，领导社会、开发群众，须长于言语。因设小组会习为演说、辩论，……又以方言非一般人通晓，令习国语。”论述的题目思想性极强，意在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一次，辩论题为：“世界进化，道德随而增进乎？抑否乎？”又一次是：“试列举春秋战国时爱国事实加以评论”(1)。

1902年 4 月15日，由蔡元培、叶瀚、蒋观云、钟宪鬯等在

(1)以上引文均见《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 53—54 页

沪教育家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他被推举为会长。

中国教育会的成立，“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1)它实际上是本世纪初国内最早的一个革命团体。蔡元培的革命活动就是由此开始的。

是年冬，蔡元培、蒋观云、黄宗仰、林白水等发起创办女学，经费由罗迦陵女士捐款相助，租赁校舍于登贤里，名曰“爱国女学校”。初推蒋观云为经理（校长），不久，蒋赴日本，改推蔡元培继任经理。

继建立爱国女学校之后，蔡元培与教育会诸同事又在上海创办了爱国学社。

1902年秋，南洋公学爆发学生退学风潮，蔡元培同情学生，向公学当局力争，无效，他愤而辞职，并把退学学生介绍给中国教育会。正值中国教育会要拟办学校，便决定募款援助，创设爱国学社，并于1902年11月26日在上海泥城桥福源里正式开学，一致推举蔡元培为总理，由吴稚晖任学监。

关于这两所学校的办学目的及其宗旨，蔡元培在后来的讲话及回忆文章中均有所交待：

> “本校初办时，在满清季年，含有革命性质。盖当时一般志士，鉴于满清政治之不良，国势日蹙，有如人之罹重病，恐其淹久而至于不可救药。上海之革命团，名中国教育会。革命精神所在，无论其为男为女，均应提倡，而以教育为根本。故女校有爱国女学，男校有爱国学社，……”(2)

（1）《蔡元培纪念集》，第28页

（2）《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155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